

费孝通传

[美]戴维·阿古什著 董天民译

时事出版社



费孝通传

[美]大卫·阿古什 著

董天民 译

时事出版社

1985年

**Fei Xiaotong and Soci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by R. David Arkush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1

费孝通传
〔美〕大卫·阿古什 著
董天民 译

*
时事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万寿寺甲二号)
北京时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75 字数：164,000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000
统一书号：11225·013 社科新书目：137—100
定价：1.25元



一九六五年费孝通在中央民族学院办公室

小孩

一九三六年费孝通在开弦弓村与农民



大学胜因院宿舍

一九四八年冬费孝通、夫人及女儿在清华

译者的话

费孝通教授是世界上知名的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美国阿古什（R.D.Arkush）教授所著《费孝通和在革命的中国的社会学》（我把译本改名《费孝通传》），结合中国的社会变迁和社会学的发展，详细地介绍了费孝通教授的一生，主要是他的学术思想、社会学研究和调查工作。我们从中不难看出，费孝通教授在工作中遭受了多少挫折，作出多大牺牲。但他为了这门学科的发展，仍百折不挠地战斗下去。特别是在社会学被取消二十多年后，他为了这门学科的恢复和重建，不顾七十多岁的高龄，全力以赴。这种治学精神值得社会学工作者以及所有社会科学工作者学习。这就是翻译本书的目的。

本书的翻译工作是在萧乾同志提供原书和给予鼓励的情况下进行的。译成之后，我的老师雷洁琼教授在百忙中为之作序；阿古什教授从美国寄来《致中国读者》和费孝通教授的照片。他们的热情关怀很使我感激。

书中难解之处，均作了注释；从书、报上引用费孝通教授的话，大部份均与原书、报进行了核对。由于译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错误和遗漏之处，希望读者不吝指正。

董天民

1985年9月

致中国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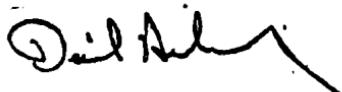
本书是七十年代为西方读者写的，在八十年代的今天，在中译本即将出版的前夕，就写作本书的动机和经过，向中国读者讲几句话，可能不是多余的。

我在六十年代是美国的一个研究生，当时我和我的同学通过费孝通的三本书，对他有所了解。他是一位很感人的知识分子，为了改善他所同情的中国农民的贫穷和苦难生活，他提出了令人信服地改革农村经济的建议。我感到，当我们通过费和其他人的著作以及我们的老师费正清（他因为批评国民党而受到美国右派的指责）的介绍，了解到中国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社会状况时，真是大吃一惊。尽管1949年后美国政府和大多数美国人对他们所谓的“红色中国”抱有敌意，但我们越是了解中国，越是同情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我们对费及他那样的知识分子在五十年代的遭遇却迷惑不解。我们作为经常与政府和多数美国人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坚信应有学术自由。在六十年代中期，当我们为美国在越南的毁灭性行动感到沮丧时，却提高了对知识分子应该自由地研究、写作和发表意见的重要意义的认识，我们所说的发表意见的自由是指可以坦率地批评政府。

我们既同情新中国，而费等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又曾一度受到不公正待遇，会不会使我们的思想产生矛盾？这是本书想对西方读者和我自己解答的问题。其中包括阐释中国在二十世纪初的西学如何培养了一大批新的知识分子——除费

外，有些人被认为对社会无用或甚至有害。阐释的结果，我是同情费的。我认为，前些时候对费所主张的社会调查的废弃不用，是一大损失。我不相信独自进行的社会学研究会解决一切或大部分社会问题，但是如果中国有更多的人象费那样顺利地进行社会调查、发表批判性和独特见解的文章，大跃进及其以后的错误会少一些。当然，现在许多人在试探这条路，成千的知识分子被培养成费及他这一代人的接班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有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财富，因此，对费的遭遇的介绍，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任何时候的任何地方，也会获得读者的。

最后，我应当说明，我为写这本书所进行的搜集材料和调查研究工作，是在美国图书馆、香港和台湾等地进行的。那时我不在中国大陆，实际上当时一个美国人进入中国大陆是困难的，而在中国大陆进行调查研究尤为不可能。费在文章中不只一次提出，他对我写这本书未给予任何帮助，与我会面时拒不谈他自己和他的身世。假如这本书是经过同他以及中国的其他人交换意见写成，质量将会更高些。而实际上我写这本书主要是凭借费本人的著作。本书有的地方可能不适合中国读者的口味，我表示歉意。但是，会有一些人对我给予费1949年前形成的思想和发表意见的分析感到兴趣，因为那时对当前的许多中国的读者来说，是遥远和陌生的年代。



大卫·阿古什

1985年8月21日于衣阿华市

序

大卫·阿古什教授所著《费孝通和在革命的中国的社会学》一书，论述了费孝通教授从事社会学研究的过程，还涉及到他的其他社会、政治活动，我认为可以称之为《费孝通传》。

我与费孝通教授是在1931年才认识的。1930年他从东吴大学转学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我于1931年从美国回来后，到该校社会学系执教。在系主任吴文藻教授领导下，我们参加系的会议讨论社会学的问题，接触较多。他思想活跃，给我很深印象。后来他受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派克教授的影响，由埋头读书转向研究实际社会问题，从事社会调查工作。接着在清华大学和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先后受到俄国人类学家史罗克格洛夫和马林诺斯基教授的培养。费孝通教授是国际上人类学功能学派的知名人士，1980年接受美国国际人类学奖。

他在清华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偕同新婚妻子王同惠去广西瑶族部落进行实地调查。不幸王同惠在这次调查中牺牲了。她曾选修过我的课，还差一年才毕业，竟在事业刚开始时就离开了人世，不胜惋惜。费孝通教授当然比我们更为悲痛。但他化悲痛为力量，继续进行多次的农村调查和少数民族调查，写出不少报告和文章，博得国际上的赞誉。

新中国成立后，高等院校进行调整，社会学从课程中取消，费孝通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任副院长，我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任副教务长。1956年国务院成立专家局，我们同时出任副局长。那时他很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工作，希望能协助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使知识分子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但不幸因此遭受了不白之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乔木同志建议和鼓励恢复社会学。费孝通经过努力，联系了一部分社会学工作者，在1979年3月成立社会学研究会，后改为社会学学会，选举费孝通为会长。社会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学科遂得以恢复。以后又成立了以费孝通教授为领导的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一些大学也建立社会学系或开设社会学课程。中断了将近三十年的社会学，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由于不少青年对这门学科有兴趣，又蓬勃地发展起来。这和费孝通教授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费孝通和在革命的中国的社会学》的翻译出版，将使不懂英语的读者有机会读到这本书，了解社会学在我国的发展过程和老一辈社会学工作者的治学精神，这对我们如何创建新中国的社会学可以得到启发。

雷洁琼

1984.11.22

目 录

序	雷洁琼
第一章 家世和学生时代	(1)
家庭和在吴江及苏州的早期生活	(1)
在教会学校：东吴大学和燕京大学	(6)
已经成长起来的费孝通	(11)
第二章 接受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教育	(18)
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20)
派克教授与费孝通	(26)
在清华大学跟史罗克格洛夫学人类学	(30)
在伦敦受业于马林诺斯基	(34)
功能学派的费孝通	(39)
第三章 在广西、江苏、云南的实地调查	(49)
1935年结婚后去广西作实地调查	(52)
1936年开弦弓村的农民生活	(57)
1938—1939年在云南禄村	(63)
费孝通的社区调查的意义	(67)
1939—1946年在云南实地调查工作站	(75)
第四章 一位中国人类学家眼中的美国	(81)
1943—1944年访问美国	(81)
对美国文化认识上的变化	(87)

1947—1948年批评美国的政策	(97)
都市工业	(102)
第五章 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108)
受人民欢迎的作家费孝通	(108)
农村中国的文化模式	(112)
绅士与社会浸蚀	(120)
改革建议：农村的工业化	(126)
第六章 1945—1948年的政治活动	(136)
1945—1946年在昆明	(137)
1946—1947年重访英伦	(150)
政治理想：民主和社会主义	(154)
1949年前费孝通和共产党	(159)
第七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66)
1949—1950年解放初期的热情	(167)
1950—1956年从事少数民族工作	(177)
第八章 百花齐放时期及以后	(189)
知识分子和政治	(191)
重议社会学和重访开弦弓村	(198)
1957—1958年的反右派运动	(205)
尾声：恢复百花齐放政策	(220)
跋（1981年3月）	(225)
附 录 我看人看我	费孝通 (230)

第一章 家世和学生时代

以其有关中国农民的著作闻名于世的费孝通，并没有农民的经历。他出身于一般称之为小士绅的家庭，不是在农村而是在小城市长大。他的父亲是教师，曾东渡日本留学。他在辛亥革命前一年即1910年出生，那时科举制度已取消好几年了。他在出国留学以前，主要是在美国教会创办的学校和大学读书，受的是西方的教育。

他在以后的写作中提出“社会浸蚀”，即地主士绅象水土流失那样迁出农村。他的双亲在本世纪初也从小集镇迁到县城，以后又迁到苏州。而他与他的哥哥及堂兄弟们，则分别迁到北京、上海或者国外。他的家庭成员，都是变卖土地以后，从农村迁到城市，后来去国外留学，接受西方思想，谋得现代化职业。从他以及他的亲属的生活，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史具有伟大意义的演变过程：旧的地方士绅迁到城市，接受西方思想后转变为现代化知识分子，从而脱离构成大部分中国的农村社会。

家庭和在吴江及苏州的早期生活

滔滔长江流经华中后入海，它把江苏省一分为二。江南是平原，上面布满湖泊，而大运河则与长江交叉而过。该地区大部分是水域，船舶则是主要的交通工具。那是人口稠密

的鱼米丝绸之乡，是几世纪以来中国最富庶和商业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学者、诗人、画家等人才辈出的文化发达地区。十九世纪末，它成为西方势力入侵的地方之一。由外国控制的大上海即在江海汇合地区蓬勃发展起来。上海以西不远的地方，是位于大运河畔的苏州市，吴江县则在苏州以南的太湖边上。

费孝通的祖先之中虽然没有知名的作家或作大官的，但也都是上流社会有教养的人。他们大多数是地方上有名望的地主，据他的一位舅舅谈，费家在吴江县有几百亩稻田，但到1900年已出售一空。这与费在五十年代写的一篇检查是一致的，该检查说“我出生在地主家庭，但到我祖父时已家道中衰”。他的祖父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去世，是一位生员，这是最低一级的功名，不能进衙门作官。他居住在吴江县的同里镇，镇上仅有三、四名读书的人，其中之一名杨敦颐。他死后，他的幼子（费孝通的父亲）由杨家帮助抚养，以后与杨的女儿结婚。

费孝通的外祖父杨敦颐在事业上取得较大成就。他于1885年在每十二年举行一次的乡试中，以生员的身份中了与举人相等的拔贡，取得了进衙门当官的资格。他从1890年到1895年在丹徒（镇江）任学务副监督（训导），后来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他编写了初级小学教科书和怀念妻子的诗，1912年编辑辛亥革命作品文集。他于1928年费孝通18岁时病逝，终年70岁左右。

杨家在区里拥有一座碾米厂，一座榨油房和一块土地，可是在1905年迁居上海前均已变卖一空。他们的家庭比较富有，十一个孩子都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大多数获得专门职

业。长子杨天骥最为杰出，他于1902年取得优贡的功名，以后成为上海的革命记者，并在政府担任一系列职务，包括1922年担任华盛顿会议的顾问和吴江县的区长，1958年在香港逝世。次子杨锡仁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三子是北京的建筑师。另一个儿子已加入美籍，在瓦尔特·迪士尼（Walt Disney）所属企业工作。一个儿子及包括费孝通母亲在内的几个女儿均是基督教徒。

费孝通的父亲名费朴安，大约出生于1879年。最初在杨家家馆读书，以后上了洋学堂。他曾在科举考试中取得生员资格，1905年左右正当成千的人去日本学习西方新知识的时候，他也东渡留学。回国后把全家搬到吴江县城，他在那里办了一所中学。他的儿子在后来的著作中自豪地提到他如何为当地办事，包括为了减轻人口压力提出在太湖边从事开垦的计划。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同几个从上海回来的朋友赶走了苏州及吴江县的满清官吏，他当选为吴江县议会议长，但拒不担任新县长职务。后来先后担任江苏省教育厅督学和苏州一个中学的语文教师。据说，他给孩子们的影响很大。他短小精悍，精力充沛，乐观，热情，心胸坦率，助人为乐。所有这些，使他对孩子们很随便，他不仅有时亲自教他们读书，而且鼓励他们根据自己的志愿学习。1962年他84岁时仍居住在苏州，费孝通有时去看望他，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时提到他。他于1972年逝世。

费朴安大约在1900年与杨纽兰结婚，生了一女四子，费孝通最小。杨当时受了良好的教育，在她父亲创办的一所洋学堂教语文；后来她在吴江县城创办并领导了一所幼儿园。在她的一个姊妹及长老会传教士威尔金逊（T.R.Wilkin-

son) 的影响下，她参加了基督教。她于1927年病逝，当时费孝通年仅16岁。

费孝通等兄弟四人相继离开家乡，进入国内或国际的“大舞台”。他们之中有三个已有很高威望，被载入名人大辞典。长兄费振东大约生于1904年，曾在上海大学学习，由于他参加左派政治活动，白色恐怖时期逃亡海外。1927年至1948年在东南亚居住，是印尼华人社会的记者、教育家。五十年代回国，在侨务部门任职。二兄费青1906年左右出生，曾留学德国，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法律学教授；五十年代身居要职，1957年病逝后曾取得在《人民日报》上登讣告的殊荣。三兄费霍则默默无闻，他仅仅是一名土木工程师，抗战时期在国民党政府或军队中工作，六十年代在上海逝世。

只有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一直留在老家。她出生于1905年，曾在苏州附近的养蚕学校学习，后来在该校执教（于1950年与该校校长结婚）。二十年代初赴日留学。她把她的一生都贡献给改进当地的丝织生产工业，她改进农村工业的经验对费孝通影响很大。

费孝通于1910年11月2日出生在吴江县城，十岁前一直居住在那里，该县经济落后，商业比不上城东四英里（六公里多）以外的稻米集散地同里镇。城周仅有二英里（三公里多），而且城内有耕地。费家座落在松柏掩映的山坡上，是一个花果飘香的大宅院。他家在城里有薄田数亩，用以植桑养蚕。那时正是军阀混战的年月，他家三番几次的逃到乡下避难。全家共九口人，即费孝通及其哥哥姐姐等五人，父母，祖母及一个寡婶。家里并不十分富裕，但雇得起帮工，堪称

小康之家。当时费朴安在南京江苏省教育厅工作，可能是科长。

费孝通在当地公立小学读了四年书。当时能够读小学的孩子很少，他是其中之一；1922年全区与他年龄相仿的孩子，仅有78名男生、35名女生从小学毕业。小学课程表是1916年国民政府制订的，每周有八至十四课时的语文阅读、作文和书法；四至六课时的算术；两至三课时的修身；此外，还有中国历史，地理，自然，体育，音乐，手工，图画；在六、七年级增学外语（主要是英语）。他最感兴趣的是讲解当地风土人情的课，通过这门课程他了解到许多所熟悉地方的历史和传说。这门课给他的印象太深了，他后来回忆可能由于教员引起他这方面的兴趣，以至于他于三十年代重回该地进行详细调查，从而写成他的第一本书。

费孝通十岁时，全家从吴江搬到苏州。苏州以文人荟萃、美女如云久负盛名。大运河、石拱桥、窄巷、古迹、迷人的园林、茶馆等把它打扮成风景如画的城市。1920年该市有30万人口，从那时起开始接受西方影响。1896年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它与上海、杭州、无锡均有汽船往来。本世纪初修筑的沪宁铁路亦通过该市。1930年时，该市已有电灯、电话和四个电影院，有外侨数百人，包括几十名美国传教士。

费孝通进了苏州振华女子学校的高小班。该校校长是获伊利诺斯大学植物学学士的王季玉女士，她的妹妹王季昭也在该校执教。几年后费在文章中提到这位女校长如何献身于教育事业时说：虽然她凭藉她的外国学位可以在上海谋得更好的工作，但她仍留在苏州，在寒冬的早晨用冻僵了的手在黑板上不断地写着。王家姊妹是费孝通母亲以及杨家的朋友。